



歲月流桑

胡真驛題



刘文淳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袁忠岳

这是一本个人回忆录的合集，回忆录的主人公大体与我是同一辈人，或比我大几岁，或比我小几岁，其中有两位还是我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所以，这些回忆读来倍感亲切，因为他们使我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我们这些人的个人情况各不相同，但其人生轨迹却又非常近似。我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战争灾难与社会黑暗里度过的，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又都欣逢新旧社会交替，百废待兴，万象更新，于是很自然地一股报效祖国的理想与激情从我们心底油然而生。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不是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而是一连串暗无天日的政治打击。从反胡风、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摧毁人的一切尊严的残酷打击始终没有停止过。无法统计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究竟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牵连了多少无辜民众？摧残了多少善良心灵？毁灭了多少珍贵生命？我们这些人还是幸运的，能够幸存下来，亲眼看到这一噩梦的结束。之后的20几年，一度被垄断的阳光重又普照大地，我们这些人虽然青春不再，然而长期被压抑的才华和理想，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适宜土壤，依然开放出了灿烂花朵。从这本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回忆录的主人公都有一段苦难艰辛的经历，后来也都在文学艺术、教学科研、防疫卫生等某一方面奋发图强，做出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往事如烟又并不如烟，人生如梦也不真的是梦。过去的

固然过去了，却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刻痕。记忆是有生命的，它要活下去，活在人类的和民族的历史里，作为后来者前行的镜子。这大概就是这本回忆录中的主人公们把自己经历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记录下来的原因。他们的经历是个人的，但是透过这些个人的经历我们却看到了国家从整风反右以后 20 来年里所走的一条大弯路，它不仅耽误了社会发展腾飞的大好时机，而且几乎把整个民族引上崩溃毁灭的危崖。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居安思危，这个“危”应既包括外患，也包括内忧，即内忧那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日子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不要忘掉刚刚离开人世的世纪良心巴金对我们的提醒：“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不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由人变兽，又由兽变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希望它们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后辈身上复演。这就需要人人都能像巴金那样不忘自己是个人，下决心不再变为兽，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变兽。只有这样，那些想把人变兽的人的阴谋才不会得逞，人和人才能永远平等相待，友好相处。

提到巴金就不能不提他晚年写的五卷本的《随想录》，书中不仅有他对那个变人为兽的黑暗年代的控诉与谴责，也有他对自己为了生存甘愿变兽的阴暗心理的拷问与剖析。他这样做，不仅无损于他的人格，反而更显出其心灵的广远博大。

当我们回顾辛酸的往事时，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自省意识？为了保全自己，我们是否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有意无意地对倒行逆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北岛在《同谋》一诗中写的那样：“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若能如此，回忆录就更有意义和价值了；也使那些靠伤天害理整人起家，把个人的飞黄腾达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至今仍无丝毫忏悔之意的家伙们，更加无地自容。在这方面，我愿与大家共勉。

大学同窗敦骅兄嘱我为这本回忆录合集写序，推之再三，情不可却，才写了上面一些话，如有不当，敬请敦骅兄和回忆录主们原谅并予以指正。

2005年10月21日于泉城

袁忠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诗评家。

目 录

- 序 袁忠岳(1)
- 两次跋涉两重天 姚家琪(1)
- 第一次长途跋涉——逃难之旅 (3)
- 第二次长途跋涉——革命之路 (17)
- 苦难,我人生的老师 王学林(27)
- 血泪的童年 (27)
- 坎坷的中、青年时代 (32)
- 苦在其中 美在其中 乐在其中 (44)
- 有志者事竟成 (47)
- 投笔从戎话枪缘 陈善宏(55)
- 第一次碰枪 走火 (56)
- 第二次打枪 卡壳 (60)
- 第三次试枪 惹祸 (62)
- 第四次赠枪 喜结良缘 (66)
- 金婚话老公 熊淑庄(67)
- 依稀往事话此生 张庆彭(72)
- 战火洗礼 (72)
- 大难不死 (75)
- 六年长恋 (78)
- 难有作为 (80)
- 青春无悔 王建夔(85)
- 边疆防疫献青春 时永诚(96)
- 报一号病 以人为本 (96)

防二号病 长住戈壁	(102)
追踪天花 一场虚惊	(105)
流脑、白喉、肝炎 各历艰险	(111)
响应号召 深山挖药	(119)
衣带渐宽终不悔	(121)
光盘引我忆往昔	冯焱生(126)
情牵科大 梦回复旦	张作生(138)
上大学 难上加难	(138)
进复旦 运动不断	(142)
入科大 喜愁参半	(146)
文革火 初燃校园	(148)
迁安徽 备受磨难	(151)
育英才 不辞辛苦	(154)
对权威 敢于说不	(156)
看美国 非纸非泥	(159)
顶压力 扶植青年	(162)
搞研究 勇于创新	(164)
人老了 退而不休	(167)
留住上个世纪的情怀	
——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活的回眸	
.....	李健全(169)
印象尤深的师尊夫子	(169)
我的第二课堂	(173)
鲜为人知的两大风险	(180)
学院里的两大“风潮”	(182)
冷酷的毕业分配	(184)

音响发烧友轩主——田寿宇	刘文淳(188)
友 殇	
——悼寿宇学长	陈谦根(197)
风月无边却有边	戴贺杰(205)
父亲给我以梦幻般的童年	(205)
我的左邻右舍	(208)
风月有心确无边	(211)
小庙的菩萨也灵光	(215)
离群孤雁重起飞	(219)
依稀月子口	李寅生(228)
感受“右派”	章允芳(268)
晴天霹雳	(268)
时代需要	(271)
因祸得福	(274)
做老实人	(277)
一场噩梦三十年	蒋大鷗(278)
胡敦骅的故事	刘文淳 胡敦骅(288)
院长辞职不干了	(288)
英俊才子不风流	(297)
政治运动躲不开	(302)
爱情悄悄来敲门	(306)
二十三岁当“右派”	(312)
脱胎换骨去劳改	(315)
为人师表受尊敬	(318)
文化动乱又挨整	(324)
帽子被人拿手里	(328)

祸兮福兮到农村	(333)
文助表态保平安	(337)
暗中相助遇好人	(340)
右派平反难彻底	(344)
大难不死有老运	(350)
余 音	(360)
后 记	(362)

两次跋涉两重天

姚家琪

我从初中开始读书之日起，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天天坚持，从不间断，数十年如一日。日记是我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不得不亲手把它烧毁。

当时，我已被“勒令”迁出机关宿舍，借居在新华书店隔壁的饼店楼上，那是县工会的房子。记得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把全部日记搬到饼店后面的小天井里，先把本子撕开，然后分批抛入火堆中焚烧，事情办得彻底利索，不敢稍有疏忽。我的心血、我的忆念，全都变成迎风飘散的片片灰烬永远消失。我沮丧地伫立在火堆旁，满腔悲楚，心乱如麻，有着诉说不尽的辛酸。

我并非胆小怕事，因为别人身上已经有过血的教训。本县海防部部长林济顺，不就由于保存了几件建国前的旧军衣和旧照片，被造反派揪斗不止，结果自杀身亡了吗！我幸亏抢先一步，没有留下任何片纸只字，后来造反派几次抄家都没有找到什么把柄；否则，我恐怕也要在劫难逃了。

写回忆录必须完全真实，这是最起码的写作原则。现在我失去了日记，写建国前的经历只得靠回忆。我常常独自闷坐，苦思冥想，偏偏大脑又不争气，敲打半天也挤不出多少东西来。对于回忆出来的材料，我一加以过滤：凡属印象清晰，事实确切者，我就列入；如果印象模糊，没有把握的事，我宁可舍弃不写。

我一踏上工作岗位,就在本县的税务部门。当年的工作单位设置在县政府围墙里的几座瓦房内。那时候,每人一天的菜金只有1分2厘(全月0.36元),荤腥买不起,只能吃白菜,而且是煮成菜汤。每桌一大盆,八人围着吃。冬天盖的是棉花(不是棉被),每人二斤半,自己动手用白色的粗布包起来。人人如此,没有尊卑之分,这是我从军南下到达福州休整时领到的。每个干部整月的办公费只有3分钱,买不起纸张,只得以废纸重复利用。下乡靠步行,全县没有一寸公路,爬山越岭姑且不说,还要随身携带背包和武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事。在城关也并不安宁,兵力单薄,守卫不易,到了夜间更紧张。没有电灯,全城漆黑,行人绝迹,危机四伏。有一夜,东门外突然枪声大作,同志们纷纷惊起,而我年轻贪睡不愿中断好梦,赖在床上假装不醒,第二天张子亨主任气得把我狠批了一顿。

1951年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震动了全社会,几乎每天都有一串串的囚犯捆绑送来。刑场多数就设在南门体育场的城墙下,有时白天来不及,晚上还加班,点着汽灯行刑。

与工商界的斗争,我是亲历者,印象倍加深刻。查假帐、搞评议,1952年一场“反偷漏”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再以后,政治运动多起来,一个接一个,今天斗你,明天斗他。我真弄不懂,革命阵营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对立面?当年,人们对人和事,一律以政治标准来划分界线。你如不慎犯了“错误”,本人的惨痛遭遇姑且不说,而且还会株连到亲人和子女(如失去工作,不能上学等),甚至弄得妻离子散,家庭破裂,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政治运动多,“犯错误”速度快,各种“分子”也就接连产生,一年一小批,多年一大批,积

累起来数量可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也成了税务部门的当权派，成为斗争的对象，抄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必须烧去我的日记，因为这是我的真实“罪证”。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不幸，也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这些往事已经尘封多年，成了历史。我的这段历史也说不上对国家有过什么贡献，只不过在铺筑革命的道路上起了一颗小小石子的作用。

是啊，千万颗小小石子汇筑成革命的胜利大道。

第一次长途跋涉——逃难之旅

我出生于1930年7月。我的家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的霍山路转角处，这儿原先是美国租界，后来与英租界合并称公共租界。那是一座普通的单层平房，面积很大，可是建筑式样陈旧，光线暗淡，大门背后还有一口捣米的石臼，这座房子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我出身的第三年，即1932年日本人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战役，我的家于炮火中被摧毁。

我的新家法租界，距华界南市区只有一步之遥。法租界和南市区的中间，以环城路（今人民路）为界，任人来往。我开始上学念书是到南市区九亩地的万竹小学。因为那个学校规模大，设备好，离我家又近。后来才知道蒋经国也在这所学校读过书，这当然是一种巧合。其实，我在万竹小学的时间很短，最多不过两个学期；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抗日战争，南市陷入熊熊战火，我被迫中断了在该校的学业，转学到法租界内的其他学校去读书了。

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抗战开始。不久，日军

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战役。战争是从闸北、江湾、虹口、杨树浦一带开始，日军先向这4个区进攻；我军奋起抗击，战况空前激烈。

“八·一三”战役打响后，上海人民立即对抗击日寇全力支援。租界内，中国人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团体。这些团体，有的募捐钱物送前线，有的从事抗日宣传，有的救济和收容难民，有的帮助运输物资和救护伤员，有的组织义勇队，拿起枪杆直接参战。

当年我8岁，小小年纪，也主动把自己的一点零用钱，交给老师转送给前方战士。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述战士英勇杀敌的故事。教我们学唱爱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国歌；还有宋代英雄岳飞作词的《满江红》。我们唱着唱着，同仇敌忾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在租界里，虽说有了殖民者的“庇护”得以暂时免遭战乱之祸，但在兵慌马乱的环境中，也是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首先是物资短缺，物价上涨，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在加重。其次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而不可终日。其实最可怕的是来自天上的飞来横祸。中日开战后不久，我突然听到一声震天裂地的巨响，后来才听说：“大世界”门前掉下一颗炸弹，死了许多人。去看过现场的人讲，那儿全是血和尸骸，一个在铁塔上指挥交通的越南巡捕成了肉浆，附近的商店玻璃全被震裂，碎玻璃撒了一地。我家离大世界只隔几条马路，所以，我也想去看看热闹，但被家里的大人严厉禁止了。以后在南京路外滩的华懋饭店前面，浙江路的先施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居民区内，都曾遭到过炸弹和炮弹的袭击。

能躲进租界内毕竟还能苟延残喘、偏安于一时，所以四乡

的难民纷纷向租界涌来。我站在家门口，目睹难民们扶老携幼、踉跄而过。他们满脸愁容，神色凄凉，步履是那样地沉重。

由于逃难来的难民太多，给租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所以租界当局很快就关闭边界，禁止难民入境，这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来说，后有追兵，前无去路，更是雪上加霜。

难民们在铁栅门外哭喊求救，谁见了都会心酸，但谁又能帮他们一把呢？后来，中国的慈善团体出来，对难民发放大饼、油条、面包一类的食品，先解决他们的饥饿之苦。人们抬着箩筐，从铁栅门的这边，把食物抛过去。铁栅门那边的难民纷纷争夺，又哭又喊。

日寇的铁蹄步步逼近，南市区的大火烧了7天7夜，闸北区只剩下一片焦土，“八·一三”战役打响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直扑上海市区。11月9日起，我军开始向杭州、南京方向撤退。从此，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部沦陷，成了真正的“孤岛”。

我军在“八·一三”战役虽然失败了，但是抗战并没有失败，在这场战役中，广大爱国军民迸发出来的英勇气概惊天动地、可歌可泣。最后一仗——“四行仓库”战斗中，我军表现得格外悲壮。

“四行仓库”属于大陆、中南、金城、盐业四家银行共有的储备仓库，是一座钢筋水泥的七层建筑物，非常牢固。它位于苏州河北岸，东面是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属英租界，南临苏州河（属英租界），西面（乌镇路）和北面（光复路）属中国地界的闸北区，旗帜高高飘扬，向全世界显示着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气概。

“四行仓库”之战战斗一打响，战况就非常激烈。敌人如

欲西犯，必须先拔掉这颗钉子，所以出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手段也越来越毒辣；守卫“四行仓库”的勇士们视死如归、寸步不让，杀得敌人鬼哭神嚎，尸骸枕籍。战斗最紧张时，一个战士全身挂满炸弹，从仓库楼上的窗口跳下，与十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四行仓库”之战震惊了大大小小的西方国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尊敬。苏州河南岸的英国租界里，每天都有许多中国居民过河去观战。大家挥舞着帽子或毛巾，向勇士们致意。

“四行仓库”顶层的国旗在战火中受到损坏，显得残缺不全。国旗应当保持它的鲜明和完整。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杨惠敏的女学生，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利用黑夜，冒着极大的危险，泅过苏州河，把这面新国旗送到“四行仓库”的勇士们手中。

“四行孤军”背水作战，与敌厮杀4昼夜，歼敌200余，自己只阵亡9人、伤20余人。后来，日本人对守军将领谢晋元恨之入骨。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被4个受敌人收买的叛徒杀害，终年37岁。

噩耗传开，全上海的人都为之悲痛不已，前往吊唁的人连绵不断，据说有二三十万之多。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还特地下令追认他为陆军少将。

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也就在日寇的包围之中，因此，上海又有了“孤岛”的称号。“孤岛”的外面，断墙残壁、尸骨累累；“孤岛”的里面，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俨然两个世界。中日开战后，各地的富商、地主纷纷来上海避难，租界当局对他们很欢迎，因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资财，对于租界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所以战乱下的租界，反而畸形兴起。酒店、旅馆、剧

场、舞厅、影院等各种消费场所都是生意兴隆，热闹非凡，到处纸醉金迷、笙歌曼舞，一派繁荣景象。故而上海又有“天堂”之称。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日本侵略者就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租界当局没有力量同日方抗衡，从此，租界里的抗日活动都被勒令停止。

日军占领上海后，在租界通往苏州河北岸的各个桥面上设立检查岗哨，行人经过时要向“皇军”鞠躬行礼；否则就会挨揍或被抓。这是征服者给“亡国奴”上的第一课，我的祖母已经60多岁了，白发苍苍，瘦弱多病，经过外白渡桥时，就因为没有向鬼子敬礼而挨了一巴掌。

1941年12月8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远处的隆隆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吵醒，不知出了什么事？待到东方微亮，我爬上屋顶眺望，只见几架日本飞机在天空盘旋，黄浦江方向有阵阵烟雾升起。我到了学校，被通知停课，在回家途中，我才听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原来凌晨的炮响，就是日军攻击停泊在黄浦江的英舰“彼得烈尔”号和美舰“威克”号。结果，“彼得烈尔”号被击沉，“威克”号投降。

当日，日军进占租界，接着，办理户口登记，核发“良民证”。再就是检查各种书籍，认为有反日倾向者一律禁售，甚至连书中有“九·一八”字样者都不允许。

为了搜刮物资供应军需，日寇的经济统制也开始了，从钢铁、棉布、羊毛、皮革、木材、煤炭、粮食、药品、纸张一直到机器附件，共有18大类。这些物资要由“兴亚院”来处理，非经批准，不得移动。我家附近各业店铺的柜台和仓库，突然之间被日寇和伪警贴上封条，海运断绝，米价一日数涨。以前的租界

时代,还能从南洋进一点大米供应民食(上海人叫“西贡米”),现在完全不行了。我就吃过霉变的面粉和大米,还有各色杂粮。这些东西不仅沙粒多,而且透出一股臭味,难以下咽。

由于煤炭缺乏,电力也要限制。商店营业不能超过晚上9点,而且不许使用霓虹灯,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一律关闭,家庭照明用电不能超过定额。再加上灯火管制(防空),光亮严禁外泄,连路灯都要套上黑罩。过去的“不夜城”,现在变得黑影幢幢,阴森冷落;过去繁华熙攘的“十里洋场”,这时显得萧条凄凉。

奴化教育也开始了,日语成了必修课。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就有一位中国女老师教我们学日语,高年级的日语,上面派了一个日本人来教。广大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时时有人倒毙在路旁。到了寒冬季节,北风怒号、滴水成冰,景况更加悲惨。我每天清晨上学,都可见到普善山庄(慈善团体)的工役,推着小车沿街收尸。有一张报纸的标题是“昨夜朔风厉,路尸九十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这就是日寇统治下的上海——鬼子口中的“王道乐土”。

1943年夏,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接着向罗马挺进,意大利军队抵挡不住,节节败退。1943年8月,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下台,我们从一些现象中,也能看出若干蛛丝马迹,如:戒严时间,演习次数增多,灯火管制更加严厉,强调疏散人口,街头出现防卸工事等等。这说明,不是他杀过去,而是别人要杀过来了。

鬼子的举止越来越反常。现在它大肆鼓吹“一亿人玉碎”、“固守上海”一类的高调,看样子,他们真要孤注一掷、狗

急跳墙了。

战祸的阴影使得上海人不安起来，谁也不愿做鬼子的“殉葬品”，所以大家都在考虑“怎么办”？

值此情况之下，1944年5月17日，我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

大后方是指川、云、黔、西康（今已并入四川）数省，相当于现在的西南地区。

我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商，他的产业在“八·一三”战役中全部被毁。父亲眼看上海已经沦为战场，留在这里已无多大作为，于是毅然决定离开上海，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大后方。

1944年春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卢松华突然回到上海。从他口里，我们才知道关于父亲的一点消息。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派出大批空军来华。为了适应这个需要，成都大规模扩展机场，所以父亲又把业务重点移到成都，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时值日寇败象毕露，美国反攻在即，上海势必又要沦作战场。正巧卢松华要回上海接家眷，父亲要求卢松华把我也一起带去，他慨然应允了。

我终于要离开上海了，我向家里亲人辞别时，心里一阵酸楚，今日一别，关山阻隔，战火连绵、两地悬念，不知何时再能见面？

5月17日，我们一行十余人到北站乘火车，走进车站广场，迎面就是一面膏药旗，旗下站着持枪挂刀的日本鬼子，监视着每一个进站的中国人。见到这番景象，我的亡国之痛又一次涌上心头。近些年来，鬼子这个反面教员使我明白了许多事理，使我懂得了“爱”和“恨”，懂得了“祖国”这个字眼有多么重的分量。